



大众学术推动构建知识生产新生态

□ 李 舒



伴随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一些非专业学术背景的普通民众依托短视频、播客、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学术性话题的讨论、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样态——大众学术。大众学术是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由专业学者、知识型创作者与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学术知识进行的大众化转译、参与式传播与公共性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专业话语被转化为普通人可理解的表达，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社交网络构成其传播路径，知识在公共空间被不断补充、修正、再阐释，催生出一一种开放、流动、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生态。

让知识生产成为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

每一轮媒介技术变革都会重塑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结构。尽管技术推动知识以更快、更广、更低门槛触达更多人，但是参与知识生产的始终是少数人，大众只能作为接收端接受经过筛选的知识，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技术第一次改变了生产端的结构。一个平台账号可以让非专业者生产的内容被数百万人看到，算法推荐使细分领域知识能够精准触达兴趣人群，AI工具进一步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参与知识生产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可能。可以说，大众学术的兴起，技术是必要条件。

真正让大众学术“火”起来的，是技术门槛降低与教育基础、公众需求、商业模式之间的共振。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0%，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是大众学术的人才条件。在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通过知识更新获得职业发展、涵养精神，大众对学术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平台打通了知识性内容转化的商业模式，流量倾斜、创作激励、出版计划等的扶持，为创作者提供了可见的成长路径。技

术提供了可能性，教育提供了主体条件，需求提供了持续动力，平台提供了组织化路径，四者共同促进了知识生产权的结构性开放。

从本质上看，大众学术不是“学术的通俗化版本”，而是一种知识生产新生态。其核心特征是，知识生产的参与主体从“建制化的专业研究者”扩展到“拥有数字终端和探索精神的普通人”。这意味着，知识生产由一个少数人从事的相对封闭的专业性活动，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过程。

大众学术带来的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

大众学术最直接的积极效应，是推动学术成果向公共知识转化，促进知识普惠。专业学术传播长期依赖期刊、会议、专著等渠道，存在周期长、门槛高、覆盖面窄的局限，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学术生态中，知识博主将学术话语“转译”为易于理解的多模态内容，公众通过评论、二创等方式参与知识再生产，由知识“消费者”转化为“产消者”。

此外，大众学术还构建了非建制化的公共讨论场域。2025年青海“昆仑石刻”事件中，不同专业学者与广大考古爱好者在互联网上展开跨圈层争鸣，众多网民以转发、评论等方式深度参与，展现出专业学术难以比拟的传播效率和认知多样性。一个小众的考古学议题从专业圈层溢出为现象级公共文化事件，折射出大众学术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有助于达成更广泛的理性共识。

大众学术的“去建制化”特征，既是其宝贵的活力来源，也为其带来结构性风险。一是质量失控与伪科普泛滥。“去建制化”模式使知识生产失去了专业学术的同行评议、编辑把关等质量保障机制，人人都能成为知识生产者后，“谁来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成为现实问题。二是算法逻辑与知识价值错位。在大众学术的生态中，算法成为主导中介，其底层逻辑是追求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的最大化，而非知识价值。三是商业利益扭曲知识传播逻辑。在利益驱动下，惯用科学概念包装的伪科普层出不穷，形成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扭曲了知识传播的动机。

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是大众学术

这一新现象的一体两面。大众学术的良性发展，就是要在保留其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前提下，建立与数字传播生态相适应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公共讨论规范。

在规范与激活中寻找治理的动态平衡

讨论大众学术的治理之道，必须认清大众学术与专业学术的关系。当前，大众学术在知识传播层面已经主流化，但在知识生产层面，专业学术仍有大众学术无法替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学术的本质在于“求真”，专业学术通过同行评议、可重复性检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讨论等不断修正错误，而大众学术缺乏系统性的纠错机制；第二，专业学术通过研究经费等建制，为长周期深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大众学术天然倾向于“短平快”，难以产生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由是观之，专业学术将继续主导知识的认证与积累，大众学术则主导知识的传播与公共化，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版图正在从“单中心”走向“双轨制”。

大众学术的治理逻辑不在于“谁替代谁”，而在于促进健康发展，使知识传播与生产更加协调有序。一方面，推动平台强化管理责任，建立健全知识性信息的审核与监督机制，能够对伪科学、反科学信息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向“主动育优”转型，将内容的专业性、原创性、社会价值等参数纳入推荐模型，用算法逻辑的“隐形编辑方针”引导知识生产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公众树立作为知识传播和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建立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媒介素养和学术素养，强化观点需要证据支撑、结论应当接受检验、错误应当被承认和修正、学术讨论需要“更好的论据”而非“更大的声音”的认识，推动公众成为良好知识生态的守护者。

归根结底，大众学术的治理要在“规范”与“激活”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形成以公众为主体、以平台为枢纽、以法治为底线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推动大众学术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生力量。

走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大众学术的兴起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在这一优良传统中理解大众学术，包括几个重要维度。

人民性是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从“为人民做学问”到“让学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人民性始终是这一传统的价值核心。大众学术正是这一立场在数字时代的规模化展开。

实践性是认识论根基。我们党从来不把知识生产视为书斋里的孤立活动，而是将其锚定于社会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大众学术使科学爱好者、基层工作者、技艺传承者等普通人，得以将其实践经验转化为公共知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之中。

群众路线是方法论路径。知识的来源不应局限于学术组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重要的知识生产方法论。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知识，如方言、民俗、民间技艺、地方史等容易被专业学术忽视，但在大众学术生态中却能找到积极参与者。此外，在需要大规模观测的数据密集型领域、需要多元认知框架碰撞的交叉创新领域，大众学术的分布式参与和认知多样性都具有独特优势。

开放性是时代要求。知识生产是在与时代、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当前，全球知识竞争激烈，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 and 话语体系影响仍在，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如何营造一个开放的知识生态，既保障知识的可靠性与普惠性，又保护大众参与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让专业学术与大众学术在分工协作中形成合力，这是我们在世界知识竞争与大国博弈中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北京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

□ 李包庚

时代楷模作为先进模范的杰出代表，是激励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无私奉献的精神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时代楷模张富清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他还深刻指出，“我们的事业就是靠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作为生力军和骨干来推进的”，“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雄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入理解是什么精神塑造了时代楷模、怎样传承时代楷模精神进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代楷模并非凭空产生，不是简单依靠荣誉表彰塑造出来的精神符号，而是个体价值追求、长期实践坚守与时代发展需求融合的结果。奉献精神是贯穿时代楷模精神品格的核心要素。作为一代代先锋模范坚守初心、服务人民的精神特质，时代楷模群体所展现的奉献精神，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善举，不是短暂的道德表演，而是在长期实践中沉淀、内化为人格自觉的价值选择。这种精神滋养淬炼了品格，校准了价值，锻造了时代楷模。

奉献精神的首要标尺，是回答“为谁奉献”的根本问题。时代楷模的共同特质，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于个人得失之上。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主动奔赴条件艰苦的百色担任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她遍访全村贫困户，手绘贫因户地图，摸清每一户群众的困难诉求，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千方百计带动群众增收脱贫。虽在一场山洪中因公殉职，但她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无私的奉献精神。当个人发展机遇与群众的迫切需要发生冲突时，奉献精神指引她跳出个人发展考量，将服务群众作为人生选择，彰显了时代楷模的为民奉献精神。

奉献的考验，更多不在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与艰辛之中。钱海军是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一名普通客户经理，20多年来坚持无偿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提供电力志愿服务。他手机常年保持24小时开机，无论寒冬酷暑、深夜凌晨，只要群众有电力维修求助，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志愿服务仅依靠个人力量还不够，钱海军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人，组建志愿服务团队，带动上千名志愿者参与惠民服务，把一个人的奉献扩展为一群人的坚守。支撑这种志愿服务的，正是奉献精神所铸就的思想定力。奉献精神消解了“付出就要回报”的功利主义考量，让平凡岗位上的长期坚守成为可能，在点滴坚持中塑造了楷模形象。

奉献常伴随随着牺牲，践行奉献精神，意味着主动迎接风险挑战，在攻坚克难中扛起责任。黄诗燕在地处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炎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八年，走遍全县所有村落，深入深山调研，立足本地资源发展黄桃等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带领全县人民实现脱贫摘帽。山区脱贫攻坚任务千头万绪，矛盾难题层出不穷，没有迎难而上的担当，就无法完成艰巨任务。奉献精神赋予人直面困难的勇气，让个体能够主动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攻坚克难的实践淬炼中，成长为群众信赖的时代楷模。

奉献精神塑造了时代楷模，时代楷模彰显了无私奉献的人性光辉。发挥时代楷模示范引领作用，目的就是推动奉献精神持续传承、落地践行。传承不是简单的口号宣讲，而是要搭建载体、完善机制，推动楷模精神从个体品格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融入基层治理、岗位实践、社会生活之中。

做好榜样叙事的深度阐释，避免典型宣传流于表面化、碎片化。宣传不能仅停留在好人好事的简单罗列，不能缺少对其背后精神价值的阐发。传承奉献精神，要深入挖掘时代楷模事迹背后的初心逻辑，把先进事迹置于时代背景中来解读。阅读张桂梅，不能只看她创办女高的结果，更要读懂她“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执着追求。张桂梅殚精竭虑办学，十几年间帮助上千名山区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这不只是个人善举，更是教育扶贫的典范，需要深入挖掘其深层逻辑，让受众理解奉献精神不是道德苛求，而是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价值选择，以此增强精神感召力。

立足岗位，推动奉献精神常态化落地。奉献不是少数英雄模范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在本职岗位践行的价值追求。钱海军的实践探

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钱海军不仅个人坚持做好志愿服务，而且依托基层党组织搭建平台，把个体奉献转化为组织化、体系化的为民服务机制，形成“六心六型”实践范式，为各行各业常态化践行奉献精神提供了样本。其一，秉持工匠精神，锻造卓越型基层党组织。只有精通业务，才能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弘扬奉献精神，就要鼓励以专业能力支撑奉献担当，锻造精益求精、精耕细作、追求卓越工匠之心，全面打造本领过硬、作风优良、实绩突出的卓越型基层党组织。其二，秉持热诚心，锻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奉献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是对群众饱含温情，把群众小事当作大事来办。践行奉献精神，就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心系群众，持续建设全心为民、暖心惠民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其三，秉持坚韧心，锻造攻坚型基层党组织。民生难题很难一次性彻底解决。践行奉献精神，要常怀不惧琐碎、不畏辛劳、不弃微小、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坚守之心。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要敢于直面基层治理难点、民生服务堵点、改革发展痛点，持续锻造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攻坚型基层党组织。其四，秉持探索心，锻造首创型基层党组织。时代环境在变，群众需求在变，奉献的形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弘扬奉献精神，要有勇于创新、善于突破、先行先试的探索心，不断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治理方式、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打造敢闯敢试、勇于突破的首创型基层党组织。其五，秉持拼搏心，锻造战斗型基层党组织。新征程上任务艰巨，需要敢打敢拼、敢闯敢干的奋斗姿态。弘扬奉献精神，要发扬苦干实干、奋勇争先、不屈不挠的拼搏心，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斗型基层党组织。其六，秉持奉献心，锻造志愿型基层党组织。楷模精神传承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从“一人奉献”到“人人参与”的转化，让奉献成为社会风尚。弘扬奉献精神，既要有个人率先垂范、无私无我、甘于付出、薪火相传的奉献心，更要持续建设全员参与的志愿型基层党组织，从一人行善带动千人同行，从个体奉献发展团队志愿，形成星火燎原的志愿格局。

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文化生态，夯实奉献精神传播的社会土壤。在社会思潮多元交织的当下，功利主义、精致利己等观念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奉献精神的感召力。这就需要持续发挥时代楷模的示范作用，通过理论宣讲、事迹展览、故事传播等多种方式，持续讲好楷模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见贤思齐，自觉对标时代楷模，把奉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奉献精神，不是否定合理的个人利益，而是引导人们跳出纯粹利己的思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院长论坛

把研究人和研究事结合起来

□ 张丽丽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要把研究人和研究事结合起来，避免从抽象到抽象，凭感觉下结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知事识人、人事合一的科学工作方法，破除了干部评价中主观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弊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改革发展、民生保障任务艰巨，干部履职场景更加多元复杂。唯有坚持研究人和研究事深度融合，以事察人、以人观事、人事互证，才能客观公正评价干部德才表现、担当实绩，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坚实保障。

甄别贤能、选用良才，自古以来便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资治通鉴》有言，“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点明识人用人的根本在于求真务实、据实评判。人是干事主体，事是履职载体，干部的品行能力、作风担当，只能在具体实践、为民办实事中真实呈现。要防止人事分离，重材料轻实绩、重印象轻口碑、重静态标签轻动态表现等问题，避免造成主观臆断、识人失真。紧扣人事相

融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科学方法、多维视角、务实举措精准识人选人，切实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实绩起于实干，担当见于躬行。坚持以事察人、凭绩论才，是摒除主观臆断的治本良方。人的综合素质并非一成不变，会在履职干事的历练中逐步显现。如果只靠抽象印象去评判，就很难看清真实水平，必须立足实践审视研判，让识人评价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实践之上。“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品评人物不可依托虚浮辞藻，务必以实际成效作为凭据。识才不能囿于机关案牍之间，更不可凭口头汇报仓促定夺。考察的脚步应当奔赴攻坚前沿，扎根基层一线，驻足民生现场。紧盯重点任务推进脉络，静观危难时刻抉择取舍，体察琐碎事务中的坚守。善辨绩绩与潜绩，兼顾眼前成效与长远基业，既看见落地见效的现实硕果，亦体察润物无声的奠基之功。于一桩桩实事之中丈量干部格局，以一件件实绩筛选勤勉笃实的实干良才。

人心藏于表里，才干显于境遇。仅凭一隅见闻、片刻接触，难以窥见干部完整面貌，要从近距离、多角度考察。人的外在表现常受环境左右，若仅从单一维度去观察，很容易陷入认知盲区。仅凭碎片化印象下结论，

难免夹杂主观偏见。唯有跳出固有视角，多方信息交叉印证，才能降低主观误判，还原事物本貌。既审视其一贯表现，观察其大局襟怀与恒久定力，不以一时得失轻下断语；又聚焦细微之处，留意处置难题、日常处事的点滴细节，甄别潜藏短板与不足。统筹日常考核、专项督查、急难历练等多方信息，兼顾八小时内外言行举止，做到远近互证、表里相察，描摹丰满立体的干部画像。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群众身处治理末梢，对干部作风品行感受最为真切。为民事事成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很多工作做得实不实、作风好不好，纸面材料难以完整反映，长期打交道的群众感受最直接。重视群众的评价声音，就是从为民服务的原点看人，避免只看工作表象，真正读懂干事背后的为民初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把群众的真实感受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从群众的真切评价中体察干部本心。干部品行优劣，群众自有公论。要走出机关大院，走进村居街巷，静听坊间乡语。广泛听取基层干部、服务对象的真切心声，体察干部纾解民忧、待人处事的本真状态，检视其清正自持的操守底线。把群众获得感、认同感作为重要评判标尺，于乡谈俚语之中读懂干部为民初心，遴选出心

系百姓、扎根乡土的务实公仆。

美玉需经千琢，贤才贵在久察。识人辨才绝非朝夕之功，唯有持之以恒跟踪考察，方能实现识人与育才双向共进。人的成长需要时间沉淀，能力在持续历练中不断增强，心性于反复磨砺中逐渐成熟。短暂考察只能捕捉某些节点的状态，长期跟踪才能看清变化轨迹，准确判断成长潜力，防止仅凭一时表现仓促下定论，做到识才与育才同步推进。“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不经世事磨砺，才干高下便无从分辨。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以长期跟踪观察的方式，持续记录干部履职情况。看一看平常岗位上能不能守纪，繁重任务面前能不能坚持，随着阅历增长取得哪些进步。依靠长期持续的观察，树立踏实干事的用人导向，形成识人、育人、用人的良性循环。

